

從《磐石雜誌》看 民國天主教會的中國意識

■ 劉定東

中央民族大學宗教研究院

一、《磐石雜誌》概說

《磐石雜誌》為中華公教青年會（中華公教進行會青年部）全國指導會主辦的公進青年部會刊，它創辦於1932年6月，初為季刊，從第二卷起改為月刊，停刊於1937年7月，出至第五卷七期，凡四十二期^[1]。其雜誌社和編輯部設在北平輔仁大學中華公教青年會支部，並且由該支部的青年天主教知識分子擔任編輯者，刊物由劉復（劉半農）為其題名，關於《磐石雜誌》之釋名，創刊號上發表了時年93歲的著名天主教學者馬相伯^[2]的題字：「磐石喻聖教，唯聖教能予人以真福常生，大學諸君能闡明教義真諦，則頭頭是道矣。九三相老人題」^[3]。

從創刊號上編輯部所述的雜誌章程可以看到，《磐石雜誌》是一份立足於公教立場，同時注重中西文化思潮的闡發，並且兼顧與公教以外學者對話的天主教刊物^[4]，其中存在大量的對於教友社會生活以及當時社會問

題的討論。總的說來，《磐石雜誌》是為中華全國公教青年會的公開刊物，它以聖教會思想為標準，匯總各支分部會務及所進行的事宜，始終以提倡青年修養為目的。內容方面，其主要刊載言論、文

藝、科學哲學、批評、記載、翻譯等內容。其中第一卷較為單調，多為宗教性內容。此後逐漸豐富。

通過對於其內容文體的整理我們可以發現，《磐石雜誌》所刊文章主要集中於公進事務說明與學術性說理論著的領域，同時亦兼顧其通俗性的必要，刊載了為數不少的文藝作品與一般性作品。總的說來，在其內容取向上，《磐石雜誌》重視教友（尤其青年教友）修養、學識水平的提高，但又不離對於社會實務、問題的具體討論，其議題設置是符合公進運動之精神而別具時代特色與組織特

色的。而作為一本面向社會的刊物，其所刊文章不只是應時之作，更是天主教中一類重要理論傳統——「社會信理」(Social Doctrine)的體現。

考慮到《磐石雜誌》由中華公進會總監督處

摘要：作為初創於北平輔仁大學中華公教青年會支部，後成為中華公教青年會全國指導會主辦之公進青年部會刊的公開發行物，《磐石雜誌》是1930年代中國天主教會中的一份比較著名且有深度和廣度的刊物。《磐石雜誌》中存在的我們所稱的天主教會的「中國意識」有兩方面的主要內容，即宏觀上的家國情懷與具體化的對於近人（具體社群）的關愛。前者有兩重意涵，其一是普世化的和平主義精神，其二是現實化的國民身份意識；後者也有兩項主題，即「教民」與「救民」。總體來看，民國天主教會的中國意識具有公教性、主動性、建設性、本地性與時代性的特點。這種「中國意識」的基本面向和建構過程是當代中國天主教會進一步參與中國社會歷史發展、推動天主教中國化理當借鑒的歷史經驗。

關鍵詞：《磐石雜誌》；天主教中國化；中國意識

主辦，由雷鳴遠、于斌先後任總監督的公進會青年部會刊性質以及其刊登文章的較高質量，它應當是較為代表性地表達天主教知識分子群體思想面向的一本刊物，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代表當時中國天主教會的主流思想。

而根據福柯關於知識考古學的有關理論，報刊的編訂過程事實上就是一種關於內容取捨、傾向表達的權力的實現。通過對於作為「權力」實現之結果的《磐石雜誌》的考察，可以復現其建構者亦即以其編輯與供稿者為代表的天主教知識分子，乃至民國時期中國天主教會的整體意志傾向與思想內容。又因《磐石雜誌》所處的特殊歷史時期，即中國近代社會矛盾尤為複雜的1932-1937年，中國教會對於社會問題與現象的態度尤為立體而全面，其對於「本地化」發展的總體認知就存在於雜誌所見的各具體的意見之中，本文以之為「中國意識」。即在本地化原則基礎上的，關於教會與社會（國家）之間關係的具體指導思想，包括教會對於當時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對於教民社會性責任與屬性的判斷等。

二、《磐石雜誌》中的中國意識

考察近代中國天主教（本地化）發展的歷史，1900年至《磐石雜誌》創建的這三十年間左右時間可謂至關重要，由於晚清民教環境的改善以及民國政教分離的確立等因素，基督宗教獲得了極大的發展。在庚子教難之後，教會內部中已有識之士意識到教會中國化的急迫性，所謂中國化，在當時有不同的口號，在天主教如「本地化」、「當地化」、「本土化」等，在基督教如「自立」、「本色化」、「自治」等，本質上是要讓中國人掌握教權，包括教會的治理權、經濟權、傳教權以及一定的思想權等。

從1919年《夫至大》牧函發布及至1922年剛恆毅來華，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進程全面深入，而這一時期，發生於1922-1927年的「非基督教運動」¹⁹因所包含的民族革新意識、民主自由思想，以及哲學批判意義和文化重建精神又極大刺激了中國天主教徒進一步改革教會、創新自立的意識，從而使其本地化運動進一步發展。到1930年代《磐石

雜誌》創辦之前，非基運動已基本結束，中華公進會的發展基本鋪開，社會運動的主要焦點已集中於中國的救亡圖存事業上來，而輔仁大學「廣收教內外之學生，以樹通國中之模範，庶使教中可因學問，輔持社會，教外可因學問，迎受真光」²⁰之立校精神、《夫至大》通諭「福傳在地」之革新意義等等要素已全部成為了《磐石雜誌》及當時中國天主教會何以愛國、愛人，何以處理政、教身份的基本發端。

（一）家國情懷

1. 反對不義，深憂國情

首期雜誌（1932年）之中「國際正義與和平」一文始關注國際及中國的戰爭處境，「去年『聖誕節前夕』教宗對世界通電，重審國際親睦之需要，茲令各教眾組織和平十字軍。彼云：『現在各國人民深感前次世界大戰之痛苦，第二次大戰希望其不能成為事實，因深信各文明國家，均不願窮兵黷武，自取滅亡。即有之，吾等應默祈預知勝負之天主懲罰之，賜人類以和平』。……因今日氣象之不景氣，第二次大戰爆發誠屬可能，世界如一炸藥庫，一星不介意之火，足以燃之。四萬萬中國人忙於內戰，數千萬印度人被人壓迫，經濟組織帶有危險性之俄國不特威脅歐洲和平，且足影響世界大局」²¹。（國內國際）戰爭的威脅、和平與正義的受損，實是1930年代中國最嚴重的負面情勢；而在戰爭的陰影中，日本對於中國的威脅是最為迫切，前文有述2卷5期「以公教立場批判日人侵佔東四省事件」一文，而該期既為「公教與愛國」專號，同期之中還有「公教教義中仁愛與公義之幾項原則完全施用於被敵人武力侵佔之國家」「若以走為策，則何地不危？」等幾篇文章一致對於中日戰爭現狀及其之不義性進行揭露，《磐石雜誌》之中可見一明顯共識，即中日戰爭實為當時國情之中最緊要。

再於更普遍與宏觀的層面上，中國乃至整個國際社會都被認為處在一種「非常時期」中，這種非常時期的普遍性及嚴重性在於，遍觀遠東與歐洲之局勢，無不處於緊張的局面，且這種緊張是立體式的，從社會經濟到歷史文化再到民族意識，表裡一概發生了與外的衝突，因此已接近以最激烈之方式——全面戰爭以解決緊張的邊緣。而導致

這種緊張的主因，葉世英認為即「不外是若干國的元首與國民，不滿足於現狀，不惜犧牲，力謀向外發展」，「總之，這樣非常時期的普遍與嚴重的演成，一言以蔽之，實為自私自利的心所驅使」^[8]。也因此，葉氏所認為對此非常時期之徹底救策便被歸為「廣揚公教」以求「消滅人類的自私自利之心」。這實是在以心性為社會根本以及以公教為盡善思想的基本條件下所能得出的自然結論，事實上，《磐石雜誌》對於現實國情的討論還有很多，若談及「救策」，則根本之法確常被歸為公教的教化，但並非沒有較實際而直接的建議。

2. 自覺公民，盡責愛國

國民政府於1932年召開的那次國難會議及前後幾月的大討論對於全國人民的教育作用在於兩點，一是愛國，二是民主，更進一步的，人民似以之更認清國民黨之軟弱本質^[9]，其時有人為會議之無效而疾呼，「國人，國人，現在我們的武器何在？我們的工具何在？我們的組織何在？是政府、是人民不能監督政府的結果。如何打破現狀，殺開一條出路，責任全在國人」^[10]。《磐石雜誌》在涉及政治與時局的內容傾向上是較為真切落實了教宗比約十一世的囑托的，「教宗希望中華公教教眾對於中華之和平發達與進步皆有所貢獻，並重申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通牒之言，即對於合法政府之恭敬與服從，向為吾公教所信仰主張及提倡其傳教士及信徒所要求者惟國民共有權利之自由及其保障，……」^[11]，因此其中未曾置評國民政府之軟弱。而應此蝸蟻國事，只是催人奮起，呼籲教胞國民建立公民意識，切實履盡國民之責。

進而言之，公民意識之首要，就是愛國。而公教人的愛國精神又是理所應當的，「『哀莫大於心死』，所以愛國工作以振作精神為先決條件。本來公教人愛國精神就是做模範教徒的精神。純粹的切實的公教信徒不能不愛國，因為能愛護祖國，公教的生活才有圓滿的可能。不過我們也可以換句話來把這個意義說明。公教人愛國的精神無非是，積極負責的精神。講積極，那麼一切悲觀絕望、坐以待斃等類的消極思想，都應當排除淨盡。講負責，那麼當仁不讓、進取求前的心志，就不能不徹底發揮」，中華全國公教進行會總監督于斌

進而強調此愛國精神應有對己、對家庭、對國家、對聖教這四重義務。而「救國既當從挽救人心入手，那麼也唯有公教才可以負擔這個重任。我們組織的公教進行會，以傳教為職志，也就是極有效的救國運動」^[12]。

《磐石雜誌》對於國人特別是公教青年之精神力求現實的振作，亦即希望造成公教青年以及國人對於國人以及民族前途命運的積極關切，這一點首先體現在其文章中對於愛國立場上具體實踐傾向——「抵抗侵略、圖救國難」的強調。

聖經中有這樣一段話：

「你們一向聽說過：『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我卻對你們說：不要抵抗惡人；而且，若有人掌擊你的右頰，你把另一面也轉給他。那願與你爭訟，拿你的內衣的，你連外衣也讓給他。若有人強迫你走一千步，你就同他走兩千步。求你的，就給他；願向你借貸的，你不要拒絕。你們一向聽說過：『你應愛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卻對你們說：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好使你們成為你們在天之父的子女，因為他使太陽上升，光照惡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瑪竇福音5:38-45）。[思高本]

1930年代時，國人曾以此為公教持「不抵抗主義」之據，甚至以此而反宗教，袁承斌因作闡明與反駁，首先他闡明，「『斷章取義』不是忠實的讀書法」，「福音上記錄耶穌的言語，如前面引的一段，在我們看來似乎未免可奇，但明瞭了當時的社會狀況（當時猶太人常有互相殘殺之私鬥），和文字的語法句法（常用反激的過甚其辭的語法、對比式的句法）之後，便覺沒有可奇，且很自然了」，其次討論羅馬公教對於愛仇不抵抗主義的立場，「羅馬公教最大的規誡是『愛』字。愛天主，為天主愛人。仇敵是人也應該愛，自己是人，當然也應該愛，所以不准自己殘害自己的身體，不准自殺。愛人，所以不能傷害人，不能殺人」，「但在遇到受敵人攻擊時，為保衛自己的生命，（但只在保衛自己，使敵人不能傷害自己的條件內），也可以傷害或殺死敵人。公教主張正義。所以我的權利，我的生命財產受到不義的侵害時，我在正義的立場，為愛護正義，應該抵抗他人的侵害」，「公教主張愛



仇，愛仇是要仇人為善。所以不能長養仇人的作惡，不能默認他扶助他多為不義。所以公教徒應站在可能範圍內阻人作惡犯義。有人在侵害你的權力時，你如放任他，是等於默認他，是等於扶助他作惡，多為不義。所以你必抵抗，所阻止他的不義行為」。……「公教的主張：不僅自己團體國家的利權，受人不義的侵害時，應該抵抗，但他人的國家團體，他人的利權，受到不義的侵害時，公教為正義，為人道，在可能範圍內，也應該見義而起，扶助人共同抵抗」，「這是羅馬公教原則下的抵抗侵略主義」^[13]。

這種積極的救國態度正是當時中國天主教應對國難的實際原則，無論是雷鳴遠神父身赴喜峰口參與救護與撫恤實際工作的經歷，還是「公教與愛國」專號中其他文章一並顯示的抗爭意志，都清楚地表露公教支持並願意積極投身民族、國家的救亡特別是抵抗侵略的決心，關懷國人，以至願一同奮力，得脫國難。

在更普遍的意義上，無論國難緊迫否，中國（民國）之為健全現代國家的建設與自強，還是需要一般人民從心理上的改變，不只是單純有著愛國的意識，還要有公民的認識以及民主的參與。

「現在我國表面上，是叫做民主國了，但實際上完全不然」，「民主國家的國民，必須有平等民主的精神，就是要有主人的自覺，政治的認識和興味，熱烈豐富的社會情感和愛國熱情，協作、互助、自製、負責、守法！等德性，簡言之，就是要有正確的國家觀念，並能執行國民應有的權利和義務」。而「普通對於國家觀念，或愛國熱忱，常有二種極端相反的解釋。一種可以解作離心力，就是使國家向外發展，完全站在本國的利害立場，和其他國家周旋。……一種可以解作向心力，就是使國家向內活動，努力改善國民的生活，尊重正義和和平。不欺凌鄰國，增加人類的混亂痛苦與怨仇！只希望實現人類的公共利益與繁榮，保障世界和平，漸漸進於世界大同」，「前者——離心力的解釋，是帝國主義的變象，我們不贊成。後者——向心力的解釋，合於人道主義，合於公教精神，為實現世界大同的正當步驟，且比較適合於我國民族性，及當前的需要，所以我們認定它是正確的國家觀念。每個中國

國民，都應當了解，應當堅信，而且要有實行的決心」^[14]。

如此，《磐石雜誌》之中存在的對於家國的關懷才算是完整。在複雜嚴酷的國內國際社會情勢下，《磐石雜誌》與天主教的知識分子們以籲求救胞與國民之公民意識的建立和踐行為最實際救策，而在根本上，又以耶穌基督為真光，認為福音遍傳方能達致世界的和平與有序。

（二）關愛「近人」——（中國）社會與國人

十誡之中的「愛人如己」原則對於公教教民的社會行為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而在現實中國社會的處境之中，《磐石雜誌》又展現了天主教會對於國人的根本關愛——求其得救、得教、得活、得脫國難，這是公教「愛人」教理中「關愛『近人』（鄰人）」的處境式實現與發展。《磐石雜誌》關愛之「近人」由傳統的「家庭」出發以至中華全體之國人，通過對於其具體內容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磐石雜誌》之中存在的關懷國人之情主要指向以下三個方面：全人教育、社會改良與國情討論，前者的取向是「教（育）民」，而後兩者共同的主題便是「救民」。

1. 全人教育，以望教民

《磐石雜誌》編者曾自述，「本志既建築於中華公教青年之總體上，故一切根據青年之需要，以衛護青年之信德，增進青年之知識，而養成純正完美人才，以期增進公教與社會之福利為宗旨。並由宗教之立場出發，而致力於青年之學識、教育、修養及訓練」^[15]。

《磐石雜誌》創刊號的第一篇文章「中國公教人才之需要」聚焦公教人才的培養，首先闡明人才培養之必要，即在於廣傳聖教，「聖教之不能廣揚於中國，豈因生長於中華國土之民族尚未達得救之時耶。……夫傳教之法，不限一端，倘願其廣揚流布，人人得救，自不能不以人才為第一要務。所謂人才者，即具有充分之中國學識，庶可以服人心，廣傳聖教也」，隨後又給出了對於人才養成之方法的建議，「如此吾等之『任務』，更顯而易見矣，既應將此衰微、黯淡之傳承流弊，鏟除之，改革之。此乃吾等無可疑憂之責任，應為天主之光榮，聖教之廣揚努力以行。往昔利瑪竇、龐迪我

等，無畏精神，已開吾等以光榮之先例，吾等應仿效先賢於熱心祈禱外，努力學問，廣造人才，俾作聖教之柱石，天主之勇兵，以救四萬萬同胞於火坑中」^[16]。公教人才之需要在於廣傳聖教，而傳教之根本目的在於使國人真正得救。

此外，廖惠如作為《磐石雜誌》供稿作者中專研教育者，在同一卷第四期的刊文中對於普遍之教育的意義及其目的做了說明：「教育是人類發展能力，增加經驗，應付困難，以謀完滿生活的一種努力」^[17]，並提出了五個小學之國民教育的具體方針：「1.健全的身心、2.良好的習慣——道德、3.耐勞好動的身手——職業觀念、4.日常應用的基本知識、5.正確的國家觀念」。該文討論的雖是小學教育之方針，但恰為《磐石雜誌》在部分內容設置上一類重要取向。我們可以認為，整個《磐石雜誌》在內容設置上體現著公教青年們的自我教育方向，抑或是編輯群體希望向全體國民、中國青年提供的自我教育資源，而這種教育，在其旨趣上可以用「全人教育」來概括，它既包括知識的積累也包括道德修為以及其他人文素質、社會意識的養成。

《磐石雜誌》提供的這種教育中獨特性地存在著宗教性的內容，包括宗教學、神學與信理的成分，其中純粹神學與經典信理內容的佔比並不高，在全民的面向上來看也同樣可以歸為知識的積累或暫予除外。因此較前文廖惠如所謂五點方針來說，《磐石雜誌》中的知識性文章內容在層次與深度上有了相當的提高，不再只是日常應用的基本知識，而是關涉包括中西方文學歷史、哲學宗教、自然科學、現代社會常識等內容；其說理性文章也不只是追求建立健全的身心、良好的習慣等。概而言之，其中包括有綜合知識的教育、德體美勞等綜合素質的教育、公民意識與社會意識的教育，此為盼望國人之「得教」。

2. 扶助苦弱，希求救民

在1930年代中國社會風尚改良的時代背景中，《磐石雜誌》始終關注著社會弱勢群體（婦女、兒童、鄉農、勞工）的救濟、扶助及教育，廣泛意義上來說，這兩者都在於其「社會改良」的面向之中，而《磐石雜誌》提供的關注與意見，既不失

其公教的底色，但在更多的時候表現得更為普世與知識化。對於婦女兒童、勞工的救濟、扶助及教育歸根到底是實踐性的，而《磐石雜誌》作為公共刊物僅能做呼籲與間接地紀錄。

如在婦女之救助方面，首期《磐石雜誌》之中始見其對女性，尤其中國女性的關懷，這種關懷以其現代意義而先進，文章認為即女性的受忽視與壓迫境況至今無改，而在現代中國（當時而言），卻是務必要改變的。有一期《磐石雜誌》曾連續刊登「北平婦女救濟院調查記」與「從娼妓問題談到婦女救濟事業」兩篇文章，著重關注婦女扶助的事業。又有3卷1期發布了輔大心理學系編制的「對於婦女服務之態度測量」一表，希望通過社會科學的方法向讀者進行統計關於婦女在社會經濟生活之中所任角色的態度傾向。對於女性的救濟也好，扶助也好，似都是女性解放與社會發展的外部工作，而根本性的方式，《磐石雜誌》認為應在「教育」，「人要『做堂堂的一個人』，女子是人，女子也要『做堂堂的一個人』，故女子不可沒有教育。即以社會生活方面來講，人貴能謀生自立。惟何以謀生？何以自立？則必賴學問知識而為之基礎」，而「中國的教育效果如彼，學生的成績如此，又不可不改造今日中國的教育」^[18]，因此最終需要使教育平民化、鄉村化，還要嚴格化。

還有在兒童之救濟、扶助與教育方面，關於兒童的事業，都以「慈幼」為起點，首期雜誌曾刊載童話「賣火柴的小女孩」譯文，以呼籲讀者對兒童之關愛，文後轉載有羅運炎^[19]對於慈幼事業的看法，表示「幼兒是將來的國民，國民是國家的基本。忘卻了幼兒，就是忘卻了國家的根本，忘卻了幼兒的事業，就是忽略國家基本的培養」^[20]。對於兒童之救濟，《磐石雜誌》少有專門文章論及述。前文曾提及的「北平婦女救濟院調查記」中有部分內容與此相關，全本其他文章如「公教與慈善事業」中也曾部分提及，雜誌所展現的兒童相關內容主要在於「扶助」與「教育」兩個主題之上。

毋庸多言的是，婦女、兒童相關問題是在現代文化與社會的背景下而愈受重視的，而現代社會最為顯著的特徵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與生產模式的確立與全球化，與之伴生的最為突出之社



會問題與變化是「勞工」階層的產生以及所謂「勞工問題」的急劇顯化，婦女與兒童群體事實上也部分地具有勞工之身份，亦涉於勞工之問題。《磐石雜誌》之中有重要的篇幅論述國中勞工扶助與拯救農村的問題，就其旨歸而言，正在於使國人「得救」。

三、結論

經由前文的梳理可以看到，《磐石雜誌》中存在的我們所稱的，天主教會的「中國意識」，有兩方面的主要內容，即宏觀上的家國情懷與具體化的對於近人（具體社群）的關愛。

前者有兩重意涵，其一是普世化的和平主義精神，教宗與中國教會都基於公教的公義觀對於不義戰爭進行反對，並且呼籲中國乃至整個國際社會的和平局面；其二是現實化的國民身份意識，這主要體現在「對於合法政府之恭敬與服從」以及「要有正確的國家觀念，並能執行國民應有的權利和義務」等公民原則的申明與闡發。這種對於國家間以及個人與國家合理狀態的原則性討論構成著民國天主教會「中國意識」的宏觀面向。

而具體化的、對於近人（具體社群）的關愛，是對「愛人如己」誠命的處境化實現與實踐。《磐石雜誌》以至中國天主教會曾對國人、青年、工農、婦幼等不同外延的群體進行觀照，總體說來，國人集體與青年群體挽救前途的關鍵被認為在於「教（育）民」，這既意味著需要普遍的成人教育，也務須依靠聖教真光的廣傳；而對於工農與婦幼的獨特觀照，是基於對這些群體在那一時代苦弱狀況的深刻覺察，他們的苦痛既由近現代社會轉型所帶來，也由具體的「國難」處境所造生。至於如何使他們以及全體國民從這苦難中「得救」，得以脫解，使人「得教」就是最為教會所關注的救策之一。但正如所謂「教民」有其單獨的、關於教育本身的普適意涵，「救民」也有其社會扶助的專門屬性，因此「教民」不應作為「救民」的方法路徑被理解，「教民」與「救民」是中國天主教會「近人之愛」具體化表達的兩個相互聯繫卻又相對獨立的主題。

這種「中國意識」在內容上既已清楚，其屬性

也便隨之顯現——其以基督信仰與教理思想為基底，積極回應並嘗試解決中國問題，深度觀照中國社會並與其他社會話語（特別是主流話語）體系互動，其具有公教性、主動性、建設性、本地性與時代性的特點。這種積極而正向參與時代議題的話語建構在天主教「跟上時代」以及本地化發展的多重進程中都具有鮮明的代表性，某種意義上也體現了一條天主教本地化、中國化的實際路徑，即「堅持信仰原則，自覺公民意識；參與中國社會，解決中國問題」。這是當代中國天主教持續推進中國化不可輕忽的歷史經驗與可行路徑。

[1] 停刊原因不詳，或與當月發生的盧溝橋事變有關。1937年（民國26年）8、9月本為該刊照例停刊時段（每年十期，八、九月份停刊，其餘月份按月發行），但自五卷七期發行之後便再無重發，當期刊物中未曾言及停刊，亦未見旁佐文獻記載停刊之事，現有資料只得此四十二期本，紙質版本與縮微膠捲均藏於國家圖書館，本研究依托於館藏縮微文獻（磐石雜誌[縮微品][輔仁大學中華公教青年會支部磐石雜誌社]—發行拷貝片—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中心，2018（北京：國家圖書館，2018—2盤卷片：正像，1:22;16mm）。

[2] 馬相伯（1840年4月17日-1939年11月4日），原名建常，後改名良，字相伯，又作湘伯或薌伯，天主教聖名若瑟，晚年號華封老人。為近代中國著名教育家、政治活動家，天主教耶穌會神父，以及震旦學院、復旦公學、輔仁大學的創始人。

[3] 《磐石雜誌》扉頁，中華公教進行會青年部全國指導會編《磐石雜誌》第1卷第1期（中華公教進行會總監督處）1932.6。

[4] 顧衛民，1934年《磐石雜誌》「公教與愛國」專號的民族立場，顧衛民：《社會科學》2007年，（2），第179-183頁。

[5] 1922-1927年，中國社會爆發了兩次規模巨大的抵制、反對基督宗教的運動，即非基運動。第一次運動以1922年3-8月為限，以世界基督教屆大會在清華大學召開為焦點，後迅速擴展全國範圍內對宗教，特別是基督宗教的討論、排斥與抨擊，不過這次運動僅限於知識界在學術和思想上的論爭，要求宗教與教育分立；第二次運動起自1924年4月廣州聖三一學校的學潮，至北伐結束、全國統一為止，波及全國，在範圍、規模、廣度、

深度上遠非第一非基運動所能比，此次運動有反對帝國主義、收回教育權、廢除不平等條約等具體的政治訴求和強烈的政治傾向，在教育權問題上，即是要求國家收回教育主權。收回教育權運動雖然遲至1924年春才全面爆發，但國人對教會教育問題的關注由來已久，促成這一運動爆發的原因涉及政治、外交、教育、宗教等諸多方面。既有外部條件的刺激，又有內部因素的促進，積薪厝火的教會教育在新文化運動興起以後，更處於一種隨時可能遭受攻擊的地位。

- [6]馬相伯、英斂之：〈上教皇請興學書〉，載《輔仁生活》1939年，第2期。
- [7]陳大經譯：〈國際正義與和平〉，載《磐石雜誌》第1卷第1期，1932年。
- [8]葉世英：〈非常時期之普遍性嚴重性及其徹底的救策〉，載《磐石雜誌》第4卷第6期，1936年。
- [9]蔣建農：〈簡論國難會議〉，載《民國檔案》1989年(02)，第99-104頁。
- [10]滕霞：〈國難會議給我們的教訓〉，載《國聞週報》第6卷第14期。
- [11]樞機主教嘉思巴利：〈聖教宗比約十一於民國十七年對華通電全文〉，載《磐石雜誌》第2卷第5期，1934年。
- [12]于斌：〈公教人愛國的精神〉，載《磐石雜誌》第2卷第5期，1934年。
- [13]袁承斌：〈天主公教的抵抗主義〉，載《磐石雜誌》第2卷第5期，1934年。
- [14]廖惠如：〈如何培養兒童的國家觀念〉，載《磐石雜誌》第2卷第3期，1937年。
- [15]卷頭語，載《磐石雜誌》第4卷第1期，1936年。
- [16]許文清：〈中國公教人才之需要〉，載《磐石雜誌》第1卷第1期，1932年。
- [17]廖惠如：〈小學教育方針之研究〉，載《磐石雜誌》第1卷第4期，1933年。
- [18]黎正甫：〈中國女子教育改造的幾個原則〉，載《磐石雜誌》第2卷第6期，1934年。
- [19]羅運炎：1889-約1966，字耀東，江西九江人。中國近代哲學家、基督教領袖、社會活動家、政

治人物，中國禁煙運動領袖之一。

[20]引自羅運炎語：見於〈賣火柴的小女孩〉，先導頁《磐石雜誌》第1卷第1期，1932年。

Focusing on the Chinese Consciousnes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nshi Magazine" (1932-1937)

Liu Dingdo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As a public publication of the Youth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Catholic Church, founded by the Youth Association Branch of Furen University in Beijing, and later organized by the National Steering Committee of the Youth Association of the Chinese Catholic Church, "Panshi Magazine" was a well-known, in-depth, and wide-ranging publication in the Chines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1930s. The "Chinese consciousnes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s we refer to it in "Panshi Magazine", has two main aspects, namely the macro level of patriotism and the concrete care for nearby people (specific communities). The former has two meanings: one is the universal spirit of pacifism, and the other is the realistic awareness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 latter also has two themes, namely "educating the people" and "saving the people". Overall, the Chinese consciousnes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public, proactive, constructive, local, and contemporary. This is a historical experience that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atholic Church should learn from to further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Key Words: "Panshi Magazine", Sinicization of Catholicism, Chinese consciousness